

郭雍易学思想述评

——《易》言三才之道

孙劲松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孙劲松(1973-), 男, 安徽怀远人,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摘要] 郭雍是宋代义理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核心的思想是“《易》言三才之道”。他将“三才之道”贯穿到天人起源、《周易》创作、本体衍化、卦爻交感等易学解释体系的各个层面, 在易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郭雍; 易学; 《郭氏传家易说》; 三才之道

[中图分类号] B2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1-0030-06

郭雍(公元1103—1187年), 字子和, 号白云, 洛阳人。郭雍所生活的年代, 正是北宋向南宋过渡的动荡时期。郭雍的父亲郭忠孝(号兼山)是程颐的学生, 对于《易》《庸》之学颇有研究, 后来战死在抗金战场。面对国破家亡的战乱局面, 郭雍退居山林, 隐于峡州(今湖北宜昌东南), 以平生之力精研易学及医学, 成为当时有名的易学家、医学家。宋孝宗闻其贤, 曾赐号冲晦处士, 又封颐正先生。

《宋史艺文志》记载郭雍著有《传家易说》十一卷, 《中庸说》一卷^[1](卷155, 艺文一), 《冲晦郭氏兵学》七卷^[1](卷160, 艺文六)。《经义考》还记载郭雍著《卦辞指要》六卷, 《蓍卦辨疑》二卷。郭雍还是一个医学家, 著有《伤寒补亡论》20卷。在宋代桑世昌所辑的《兰亭考》卷八中, 还发现郭雍所著短文《褚兰》, 纪录他观看“定武”旧本《兰亭集序》的事情。据朱熹在郭氏《伤寒补亡论》的后跋记载, 郭雍还有“历书、丛书”等著作。郭雍的易学代表作《郭氏传家易说》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西元1151年)。《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都收录了《郭氏传家易说》, 商务印书馆1935年编《图书集成初编》也将该书收入。《蓍卦辨疑》又作《蓍卦辨经》, 朱熹曾作《蓍卦考误》, 引用《蓍卦辨疑》的主要内容, 使此书得以保存, 见于《晦庵集》卷六十六。在易学方面, 郭雍承义理理解易之风, 推崇二程、张载而又自成一派。朱熹晚出郭雍二十余年, 二人在学术上有所交往, 他认为《郭氏传家易说》是属于义理派, 与《程氏易传》相似。在蓍卦方法上, 朱熹还根据“挂扚法”与郭雍的“过揲法”进行了往复辩论。《宋史·郭雍传》述前人评价郭氏易学的主旨是: “《易》贯通三才, 包括万理。”^[1](卷459) “三才”一词, 首见于《易传》, 在《系辞》《说卦》中有多处论述。郭雍把握住《易传》的这一重要概念, 将“三才之道”贯穿于其易学诠释的始终。他认为“《易》为三才之书, 其言者三才之道也。”^[2](卷一)本文就郭雍的“三才”思想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三才”的内部结构

郭雍认为, 三才产生的顺序是先有天地, 而后有万物, 人居于万物之中。三才中“人”的概念包括人、

鬼、神、万物,《释系辞上》云:“故人鬼之象,与卦一也。……人与万物皆一也。”^[2](卷七)在“人、鬼、神、万物”这一类属之中,圣人居于特殊的位置,圣人于天地合其德,而万物依附于圣人。《释序卦》曰:“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后万物,万物盈天地之间,人居万物之中。圣人之道,周万物而济天下,则万物复附于圣人,与天地相似,是以万物盈天地,圣人之道,亦盈天地。物尽则圣人之道尽,孟子所谓塞乎天地之间者也。”^[2](卷十)

郭雍还指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天道不以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以地广而大于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于天地,故三画皆无差殊。要其至也,混而为一,复于太极。”^[3]《总论》)三才没有大小高下之分,天、地、人三者混融而归于“太极”本体。在文王重卦之后,三才各具阴阳之位。《释说卦》云:“阴阳者,天之二道也;柔刚者,地之二道也;仁义者,人之二道也。天地人之道各二,所谓‘三才而两之’也。《易》能兼三才,则皆兼其两之之道,此易之画所以六而后成卦也。”^[3](卷九)在这里,三才是并列的关系,和于阴阳而成六位。

郭雍的三才观与其父郭忠孝大相径庭,郭忠孝明显受象数易学的影响。他认为,“盖天施复于子,地化纽于丑,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子为天正,丑为地正,寅为人正,自子自寅,三阳生而三才之道备。”^[3](卷上)《文献通考》和《经义考》都记载,郭忠孝颇明象数,“自谓得李挺之卦变论与陈子惠。”^[4]《文献通考》卷176,《经义考》卷21)从现在收集的郭忠孝的学术资料看,郭忠孝确曾受到李挺之卦变说的影响。郭雍虽自言本于父说、以述旧闻,但他对象数之学采取彻底的批判态度,《释系辞上》云:“世之言易数者,皆出于纬书、星历、灾异之学,六位阴阳末技,非圣人之道也。”^[2](卷七)郭雍的三才观基本上是围绕着义理进行阐释的,而其父之三才观却本于象数。由此也可以看出,郭雍易学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二、四圣之旨一贯于三才

自汉唐以来,经班固、孔颖达等人的考订,包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易传》的四圣作《易》说,几成定论。但四圣作《易》之旨是否同揆,宋易诸家各有见解。图书派的代表人物邵雍认为,包羲之《易》为先天《易》,文王之《易》为后天《易》,四圣作《易》各有其旨。程颐及张载以义理解《易》,将《易经》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释《易》之中没有对四圣做出区分。在宋易义理一派中,明确论述四圣同揆说的,当属程门再传弟子郭雍。

郭雍认为,四圣之旨一贯于三才之道。他指出,四圣作《易》,一脉相承。由包羲到孔子,《易》之理越来越复杂的原因是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他指出,只有天地是万古不易之定体,而人则生生无穷,自简至繁是人事必然之理。四圣人作《易》都是因“时”明道,非其私意杜撰。《释系辞上》曰:“《易》之道,故不系于有书无书,而无书则‘易’不可见,而乾坤之道亦息,以明圣人不得不作《易》之意也。”^[2](卷七)从包羲开始,其画八卦的就是天命使然,郭氏云:“乾坤六子,包羲所不能加损益也,天以示之,因以明之耳。”^[2](《总论》)文王作《易》也是如此,《释说卦》曰:“然则文王之重,不得不作矣!盖出于三才自然,非文王之私意者。”^[2](卷九)《释系辞下》又言道:“文王所作者《易》之书,非文王所作者,《易》之道。”^[2](卷七)周公系爻辞,孔子明道而传教,都是圣人“与时偕行”的结果。因此郭氏指出:“使包羲重之,非包羲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圣人随时之义,盖不然矣!”^[3](《总论》)四圣随时之义在于变易以从道,而其变化的轴心则是“三才之道”。

从横向来看,四圣之说都含有“三才之道”。郭雍认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分别象三才之道、尽三才之义、列三才之事、著三才之教。就包羲八卦而言,其本身包含有三才。“故包羲氏始画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画于上;地道主载,故画于下;人道财成辅相,故画于中。于是自任以财成辅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羲画卦之道也。”^[3](《总论》)八卦中的上中下三画,分别代表了天、人、地。包羲八卦虽具三才,但其处于三画相混、三才未分之际,卦之天地尚未判明。在文王将八卦相重“然后天地判而有九六。”^[3](《总论》)这就是《系辞下传》所说的“兼三才

而两之”。而孔子首先对“三才之道”进行归纳总结,《释说卦》云:“孔子言立天、立地、立人,言包羲之道也;言阴阳、刚柔、仁义,言文王之道也。包羲立其始,文王成其终,孔子明其终始,三圣人实出于一心,是为同道,故其书同。一圣人不作,则斯道不明,后世不复有闻矣!”^[13](卷九)

从历史发生的过程看,包羲画卦明天道;文王明地道、人道,周公、孔子皆发明人道,但天地人三才又互相包涵。《总论》云:“包羲肇三才之微,独画天卦。”“上古时天道胜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它也,故包羲氏始画八卦。”文王重卦以后,卦具备了天地上下二体,有天地之后,人道行乎其中,是以文王明地道、人道。郭雍指出,“包羲之画,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得于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为乾而地道存焉;三偶为坤而天道存焉。一奇一偶,终不可已成卦也。得与人者,知太极生天生地。天地生人,有天而无地,人无得而生也。故以包羲之画,在上为天,文王之重,在下为地。天地设位,而后圣人成能于其中。天有气,地有形,人得天之气以生,得地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两之,然后圣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之意也。”^[14](《总论》)而周公列于爻、孔子垂其教,都是以“道在成能”之意用于天下万事,以发明人道。

朱熹也认为《易》为四圣人所作。朱熹在回答学生有关张载“贞胜之说”的问题时,指出张子之说虽然不是经典原意,但只要自成其说就有价值。由此他引申论述了周、孔作《易》的差别。“大凡看经解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已如此。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15](《易十二》)朱熹认为,四圣作《易》各有特色,不可“必欲牵合作一意”,我们似乎可以由此认为朱熹是主张四圣各有其旨的。但在另一个场合,朱熹又作了另一个层面作了论述。有学生问朱熹,“伏羲始画,而其蕴亦以发现于此否?”朱熹指出:“谓之已具于此则可,谓之已发现于此则不可。方其初画也,未有乾坤四德,到孔子始推出来,然文王、孔子虽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画之中。”^[16](《释通书》)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也认为四圣之意是一以贯之的,但四圣作《易》是“和而不同”。后世圣人之所以言伏羲之未言,是因为人类社会在由“世质民淳”向“民伪日滋”发展变化,圣人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易学理论,只有“随时变易”才能“从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提出了“恭惟三古,四圣一心”的思想。

郭雍和朱熹都赞同《易》是在社会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四圣人随时取义的结果;对于圣人之意,郭氏也主张和而不同,他认为“自古圣贤,虽各有得,而未尝同”。但朱熹更著重挖掘从卜筮向义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四圣之《易》各自的特色;郭雍则强调四圣之旨一贯穿于三才之道。

三、道兼统三才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易传》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文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似乎各有所指但又难言其分别所在。“道”“易”“太极”“大衍”是《易传》中的几个可以被理解为本体的词语,由于《易传》特殊的形成过程和文理结构,给易学史上诸家留下巨大的解释空间,“道”本体说、“易”本体说、“太极”本体说、“无极”本体说……众说纷呈。

郭雍抓住《周易》“贯通三才之道”这一释《易》主旨,将“太极”、“大衍”解释为与“道”同一层次的概念,都为宇宙的根本,它们全都统于“三才之道”。他以“三才”为枢纽,提出“道兼统三才”的本体衍化观。《释系辞上》云:“盖惟道兼统三才,三才不过二象,阴阳是也。天地人皆具阴阳,故六,是之谓一阴一阳之道也。”^[17](卷七)郭氏还指出“太极”和“道”是相等的概念,“太极者,三才未分之名,统三才之道者也。两仪犹曰二象也,谓有乾坤天地之二象,而未为乾坤天地也。四象者,九八七六,阴阳老少之象。”^[18](卷七)一般认为,“大衍”之“大”为“广大”之意,“衍”为“演绎”之意,“大衍”表广为演绎之意,但郭雍认为“大衍”也是和“太极”“道”相等的宇宙本体,并对大衍数的演化过程和两仪四象作了模拟。郭氏云:“大衍,太极也,分而为二,两仪也,揲之以四,四象也。四象既生,然后太极分而为三才,两仪定而多乾坤,八卦

以成,吉凶以定,而大业生焉。”^[2](卷七)在本体衍化论方面,三才、两仪、二象、一阴一阳及大衍数中的“分而为二”都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但郭氏突出了“三才”之一概念。依此类推,他还将“四象”等同于“阴阳老少”及大衍数的“揲之以四”,在“道”的衍化中列为同一个层次。郭雍以“三才”为枢纽,将道、太极、大衍统一起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宇宙本体及衍化论思想体系。

郭雍还以“三才之道”为标准,区分了“大全之道”和“非大全之道”。他认为,只有一阴一阳之道、三才之道才能表达“大全之道”,“《易》之道,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之道,道之大全也。道之大全,天得之而天,地得之而地,人得之而人。又成于性者,有仁知圣贤之异,道尽于斯矣!”^[2](卷七)在这里,“三才之道”中的“三才”应是抽象、超形象的概念,并不是具体的天、地、人。单就天得之、或地得之、人得之的“道”,已经不是“大全之道”了。

而“非大全之道”,是道在具体的“器”“物”的层次的体现,《释系辞上》云:“道无形,故言形而上;器有形,故言形而下。形而上者,杳然而难知;形而下者,炳而易见。”^[2](卷七)根据这一思想,郭雍认为,相对于“道”而言,乾坤天地人都属于形而下的“物”,《释乾卦》云:“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一物。”^[2](卷一)在《释系辞上》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三才之内,无非物,乾坤虽非天地万物,以类言之,亦阴阳物阳物也。”^[2](卷七)既然乾、坤、天、地、人,都属于“物”的层次,那么它们都只能是道在具体层面的体现者,不能表达“道之大全”。郭氏提出“凡日用而顺成者皆道”,道体现在百姓日用之中,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中之“道”,当为“非大全之道”。

四、“卦”与“三才”的关系

“卦”与“三才”的关系是《郭氏传家易说》论述的重点,并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两者的关系具有很多个层面。

(一)就全《易》而言,乾尽天道,坤尽地道,余卦共为人道

郭雍认为,《周易》六十四卦之中,乾尽天道,坤尽地道,其余六十二卦共为人道。在《释屯卦》中,其指出:“《易》为三才之书,其言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人虽均为三才,独人道杂而多端,无天地之纯全。故纯刚为乾,而尽天道;纯柔为坤,而尽地道,至于人事不齐,一卦不足以尽之,故自屯至未济,共为人道,以配乾坤。”^[2](卷一)《释序卦》又云:“乾坤为天地,惟人事不齐,故自屯以往,皆为人道,然后可配乾坤,以见乾坤之大,非诸卦比也。”^[2](卷十)

(二)从“理”及“象”的角度说,一卦皆备三才之象

郭雍指出:“《易》之为书,其道其辞,皆由象出。”^[2](《总论》)郭雍从“象”入手,从理、象两个角度说明乾坤尽天地之道,但不止于天地;六十二卦明人道,但也含有天地人三才。《释系辞上》云:“是以一卦之中,皆备三才之象。”^[2](卷七)

《释乾卦》曰:“说卦曰:‘乾为天。’故世之说乾者止于天,不得其道,又以天为体,乾为用。夫以乾止于天,则乾象当一画,不当有人道地道而备三才也。”^[2](卷一)既然乾卦也有六位,就必然包含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中属“阳”的物都为“乾”之象。对此,郭氏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孔子曰:‘乾,阳物也。’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一物。是以三才阳物,皆乾之道。故《说卦》曰:‘乾为天’,在天之乾也;‘为圆’,在象之乾也;‘为君、为父’,在人之道也;‘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马、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乾能备三才万物之象,而三才万物之一物不能兼乾之象,故不得独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2](卷一)

乾、坤之外的六十二卦,虽说是明人道,但各卦之理亦通于天地之道。郭雍提出“圣人明人道本于天地”,《释节卦》云:“《易》卦虽以人事为主,亦末有不本于天地而来者。盖上下二体三才,亦皆具天地之象。圣人明人道本于天地,故《彖》之所言,或取变、或取二体三才,其称天地,亦非一道也。”^[2](卷六)文王、周、孔作《易》,都是以人道为主。但圣人随时取义,皆本于天地。《易》贯通三才,每一卦并非天道、地道、人道一方面所能囊括。其三才本为一理,天地人三才是相互交融的,王道合天,地道合地,人道合人。

人,人道亦含天、地、人。

《郭氏传家易说》在解释同人、豫等卦之中,详细论述了一卦之中皆备三才的思想。《释同人卦》云:“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则三才无不同。圣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圣人虽行人道,而其道未尝不同天者,盖有同人则同天矣,人道以同人为大故也。”^[2](卷二)《释豫卦》云:“贯通三才,非止人事,故论其时,则建侯行师,论其义,则天地如之。不亦大乎!”^[2](卷二)在《释节卦》之中也有相似的论述,“人知过盛之可节,而不知天地非节亦不能有成,是非独人事而已。故圣人因明天地节而四时成,为君者必法之以制度,故不伤财、不害民也。天地节者,刚之节柔,柔之节刚也。刚节柔,犹冬之有春;柔节刚,犹夏之有秋。不然,则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时乎?”^[2](卷二)

在注释《杂卦》“否泰反其类也”一句时,郭雍从对“类”字的解释引发一卦三才的思想。“否泰反类,而相驯致之道。故休否之道,复反其类。类谓阴阳之类,如君子小人一是也。否反其类,得君子则倾也;泰反其类,得小人则乱也,在人道言之,则曰君子小人治乱而已;合三才言之,故云‘类’也。”^[2](卷十一)

(三)从卦爻象而言,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

就卦象而言,一卦之中亦具有天地人三才,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释系辞上》云:“三才之天地,天地也;卦中之天地,上下二卦,又三才之象也。”^[2](卷七)在同章中,又言道:“文王之《易》,于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气而生,虽有参天地之道,而无同天地之体也。”郭氏指出,文王六十四卦由八卦相重而成,上体代表“天”,下体代表“地”,而“人”是由天地精气而产生的,于卦中无体,具人位者为“爻”。在《释系辞下》中,郭氏又突出了“圣人”在三才中的地位,“天地设位于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惟圣人成其能,以备三才之道。此所以参天地而赞化育也。”^[2](卷七)其意指天地虽然在卦中有体,但只有圣人能够成其用,由此具备三才之道。

关于“爻具人位”,郭氏云:“一卦之象,虽备三才,而六画之后,圣人道在成能,欲用于天下万事,故舍天地而独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辞皆人事。”^[2]《总论》在《释噬嗑卦》中,郭雍从分析王弼、程颐的初、上之位观点入手,阐述了自己的六爻皆位的观点,“伊川曰:‘初,最下;上,过尊位,皆无位也。…王弼谓无阴阳之位,非也。’雍曰:观辅嗣《传》文曰‘无位’而已,伊川谓无阴阳之位者,以《略例》言,初、上无阴阳定位故也。《易》之于爻,以二、三、四、五为人道之著,初、上虽为始终,然亦居六画之内,安得谓之无阴阳之位?若谓非有用事之象,则可也。”^[2](卷三)郭雍认为二、三、四、五爻为人道之著,初、上两爻也是“人位”,只是未必有用事之象。

(四)从“爻之动”而言,六爻也具备三才

《系辞》有言:“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郭氏释云:“六爻之动,动则变,所以象三极变化之道也。既象进退,又象三极者,进退特人事而,由卦全体而言,天地人之道皆具,岂独人事而已哉?”^[2](卷七)在《释系辞下》中,郭雍又论述道:“六画非他也,兼三才而两之之道也。一卦之道,各有变动,因其变动而别言之,故为爻,此言六位之辨也。”^[2](卷七)《释说卦》云:“阴阳者,天之二道也;柔刚者,地之二道也;仁义者,人之二道也。”^[2](卷九)郭氏认为,六爻之动,不仅仅表示人事,也具备天地人三才之道。从一卦而言,六爻皆为人事,但六爻的变动,也象征着三才之道,代表天、地、人三才的阴阳、刚柔、仁义都通过爻的变动得以体现。

五、结 语

“三才”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易传》对此有很多论述。郭雍根据《易传》的三才之说提出了自己的三才观。“《易》言三才之道”是郭雍易学的核心观点。郭雍对此由严密的论证,体现在《郭氏传家易说》的各个卦爻以及《易传》的解释之中。这是郭氏易学的一大特色。郭雍的易学思想尚有许多可挖掘之处,在《易》理方面,郭雍以儒家正统自居,在释《易》中强调“以经解经”,用儒家诸经典和《周易》相互引证,互为发明,特别注重《易》与《中庸》的相互阐发。其友人曾氏在为《郭氏传家易说》所作的“跋”

中指出:“其道则子思孟轲,一出于诚。广而充之,求为圣贤,皆有益于德也。举而措之事业,可以迪哲爽邦。则清静简易,悉本诸人情。”^[2]《后跋》郭雍还在批判汉易及王弼易学的基础上提出“《易》之为书,以象为本”的观点。郭雍的易学思想在宋元以后有广泛的影响。宋元明清历代易学家都对此书有所引用和评论。郭雍和朱熹关于过揲和挂扚的蓍法之争,也为历代学者所重视。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曾详细讨论了郭、朱的蓍法之争,李光地主编的《周易折中》对《郭氏传家易说》有很多引用,对郭、朱的蓍法之争也有详细的述评。近人马振彪所作的《周易学说》也对《郭氏传家易说》有所引用。

[参 考 文 献]

- [1] 脱 脱. 宋史[G]. 二十四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2] 郭 雍. 郭氏传家易说[G]. 图书集成初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5.
- [3] 景旧抄本兼山易解[G]. 大易类聚初集: 第6种. 台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年影印旧抄本.
- [4] 马端临. 文献通考[G]. 朱彝尊. 经义考.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 [5] 朱 熹. 朱子七经语类[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GUO Yong' s Thought of Iching Learning

SUN Jinso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UN Jinsong (1973-), male, Lecturer,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majoring in Chinese philosophy.

Abstract: GUO Yong is one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scholars in the iching school who study the philosophic connotation of Iching in Song dynasty. The core idea of GUO Yong was to claim that the main idea in Zhouyi is the way of three powers. He considered that the way of three powers lies in the system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Iching learning, for example, the genesis of heaven and man, the writing of Zhouyi, the evolution of reality,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hexagram and lines etc. It had some effect on the history of Iching learning.

Key words: GUO Yong; Iching learning; *Guoshi Chuanjia Yishuo*; the way of three powers